

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评介

耿虎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厦门 361005)

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方面,对教学史的研究相对滞后和薄弱。已有的成果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涉及的时段也多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近代乃至古代的情况,则鲜有论及。这种状况不仅与源远流长的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严重不符,而且也极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只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的事,难怪有人称它为“小儿科”。由此可见,教学史的研究不仅关乎整个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对外汉语教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这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在不少学者的呼吁下,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成果不断涌现。董明先生新近出版的《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就是这方面具有开拓意义的一部力作。

董著以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为题,“以中国历史朝代为序,以接受汉语汉字传播的国家和地区即‘汉字文化圈’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该圈以外、地域涉及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的宗教群体”,洋洋数十万字,清楚地揭示出了不同历史时期汉语汉字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关宗教群体中传播的情形,包括传播的主体、对象、范围、内容、途径、手段、方式、深度、结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所形成的影响、所应汲取的经验教训等内容。作为系统论述我国古代汉语汉字向外传播历史的一部专著,董著征引宏富,涉及面广,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科学性与学术性统一、资料性与可读性兼备的佳作。

一、有重点地分地区、分时段对汉语汉字的向外传播情况进行阐述。全书共分“朝鲜半岛篇”“越南篇”“日本篇”和“宗教篇”等四大部分,每部分之中又细分若干章节,按历史发展的进程分时段进行介绍,一般是起自上古,止于明清。四部分中的前三部分都是“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区,也是董著研究的重点;第四部分虽以“宗教”命题,但在不同宗教群体的具体叙述中仍以地区和时间划线,其地区涉及到“汉字文化圈”以外的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作为一部语言文字传播史的研究著作,董著体例上的这种安排是很合理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语言文字的向外传播,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情况和特点,

[收稿日期] 2003 - 08 - 06

[作者简介] 耿虎,男,博士,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研究。

很难一概而论。就我国古代汉语汉字的向外传播而言,历史上所形成的“汉字文化圈”自然是首当其冲的主要地区。董著选取“汉字文化圈”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有充分的代表性,而且所得相关认识也很有说服力。以中国历史朝代为序,分时段地进行探讨,既是史著的一般要求,同时也可以清楚地反映汉语汉字向外传播过程中的不同时代特征。区域的断代研究是一种细致研究,也是通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情况弄清楚了,总体的面貌才能呈现出来,科学的规律也才能找到。董著立足于局部的细致研究,着眼于全局的通识结论,科学合理的体例安排是其一大特色。

二、着力挖掘与汉语汉字对外传播相关的丰富内容。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对外传播交流往往不是单方面的事,它既包括传播方,又包括接受方;作为传播交流的动因,既有具体传播者的主观努力因素,也受当时国家政策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作为学术研究来讲,不仅应弄清语言文字传播交流的一般情况,而且还应尽量阐明它如何向外传播,以及之所以能够向外传播和传播出去之后的意义、影响等等。一句话,只有把与传播相关的情况交代清楚了,才能给人以深刻的认识。董著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将研究引向了深入。如“朝鲜半岛篇”中的“明代朝鲜人的汉语文学习”章(P131—176),作者先从双方对汉语文学习的态度入手(“明政府重视高丽的汉语文学习”“朝鲜重视汉语文学习的主客观原因”),然后谈教授汉语文的具体机构(“朝鲜的司译院”“朝鲜的学校教育”)和人员(“流落到朝鲜的中国军人——李相”),再谈汉语文学习的重要渠道(“派留学生来明学习的周折”“从中国购买汉文典籍”)、措施(“朝鲜政府保障汉语文学习的积极措施”“明朝君臣的推波助澜”)以及教材(“《老乞大》与《朴通事》”),最后谈汉语文学习的意义与影响(“朝鲜汉诗文创作的繁荣”“训民正音的创制与汉语学习”)。在具体问题的阐述上,如“朝鲜的司译院”一目中,除了介绍司译院的设置情况外,还涉及到学习内容、所用教材、教学效果以及教材的针对性等诸多细节问题。再如“越南篇”中的第六章第七目(P302—321),围绕着越南黎氏王朝时期汉语文人才的培养,作者归纳出8个方面的措施,并逐一做了细致的分析点评。可见,作者对汉语汉字对外传播情况的考察,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情况的介绍,也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联系可能联系的方面,做全方位立体式的透视。由于作者的关照点颇多,加之掌握的资料又十分丰富,因此,但凡该课题以内的有关问题,大多能给人具体而微的切实认识。书中论述的内容,除了传播的主体、对象、范围、内容、途径、手段、方式、深度、结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所形成的影响、所应汲取的经验教训等外,在传播形式上,也未“局限于对外汉语教学一种途径”“举凡历史上存在的、有利于汉语汉字对外传播的其他方式与渠道……也都有选择地纳入了本书的考察范围”(P640—641)。纵观历史,考察中外,董著概括出了古代汉语汉字向外传播的6条主要渠道:“一是历代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教育,二是外国宗教界人士的汉语文学习,三是‘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办学活动,四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境外教汉语,五是分散于中国民间的对外汉语教学,六是各种中文典籍的对外流布。这6条渠道并行不悖,互相影响补充,有时互有交叉,共同构成了古代汉语汉字的对外传播网络。”(P546)应当承认,作者对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渠道的这一概括,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也最为全面的一次。作者以6条传播渠道为主线,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几乎涉及到了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的方方面面。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传播的全景和详细过程,而且可以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传播中的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在相关的学术成果中,像董著这样系统专门深入的研究还不多见,所以其价值和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三、将对外汉语教学置于汉语汉字对外传播这一大背景下进行阐述,拓展了对外汉语教学

史研究的空间。对外汉语教学是汉语汉字对外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董著在考察汉语汉字对外传播时,虽未“局限于对外汉语教学一种途径”,但“中外古代史上出现的、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各种形式的汉语教学活动,将始终受到足够关注,并居于本书的核心地位”(P64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董著既是一部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同时也是一部对外汉语教学史。而作为教学史,董著这种将对外汉语教学置于汉语汉字对外传播的大背景下进行阐述的做法,尤其匠心。这无异于为人们全方位认识对外汉语教学搭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广阔平台。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做参照,人们对对外汉语教学历史地位的考察,就可以避免孤立地看问题,而是从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大势中去把握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贡献;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做铺垫,人们对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特点的认识,就可以从根本上分清源流,弄清枝干,在对比中去揭示对外汉语教学的个性所在;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做依托,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也就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供探讨的内容也就随之“多”了起来,而相关的论述遂也显得得心应手,进退有度。可见,董著这种将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汉字对外传播联系起来考察的做法,不仅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历史上对外汉语教学的认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的空间。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往往带着对现代对外汉语教学概念的偏执理解,按图索骥,去考察古代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在所获不多的情况下又往往遽下结论,认为古代没有什么像样的对外汉语教学可言,更没有多少好的经验可总结,于是教学史的研究也就越走越窄,甚至无人问津。从董著中我们可以看到:至迟秦汉时期,汉语汉字已经在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所传播;汉代以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深入,其传播范围更逐渐扩大,不仅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西南亚,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陆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语汉字的传播。伴随着汉语汉字的向外传播,古代史上不只中国曾经长时期开展过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活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外国也都有着悠久的汉语教学的历史,并积累了许多这方面好的经验和方法。真可谓地域不分中外,形式不拘一格。国外的情况暂且不谈,即以我国古代的对外汉语教学而言,不仅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而且内容极其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既有一对一的民间私人授业,也有大规模的政府机构办学;学生中既有生活在本国的普通外国居民,又有受委派来华的正规留学生;教师中既有在国内工作的,也有被派往国外任教的;有的是名正言顺的对外汉语教师,有的虽无教师名分但却有过对外汉语教学的经历;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除了教育界,还有宗教界……等等。可见,即使是对外汉语教学史本体的研究,可供挖掘的东西也不可谓不多,可供开拓的领域也不可谓不广。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认真地去挖掘了以及如何去挖掘的。研究思维的活跃,往往来自对研究对象的深刻认识和合理把握,董著之所以能够将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多少东西可谈的古代对外汉语教学史饶有兴味地写成洋洋数十万字,且意犹未尽,除了深入挖掘研究课题本身所实际蕴涵的丰富内容外,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作者对古代对外汉语教学的全方位把握,而将对外汉语教学作为核心置于汉语汉字对外传播的大背景下阐述,不只关注一般情况,同时着力挖掘相关细节,正是这种把握的具体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董著这方面的成绩,对于目前亟待加强的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而言,无疑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四、广为搜集和利用史料,探幽发微,言而有据。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之所以长期以来相对滞后和薄弱,除了人们认识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料的搜集相对困难。特别是古代的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不仅资料极为零散,而且史料中有价值的内容也往往非常

有限,这给研究工作带来较大的麻烦。所以,没有耐得住寂寞和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很难有所收获。董著是在翻阅了数百种中外文献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有的文献翻阅而无所收获”之后写就的,其精神令人钦佩。程裕祯先生在为董著所作的序言中曾写过一段很有感慨的话:“时下是一个比较讲究功利的时代,而且特别是一个急功近利、追逐鸿利的时代。只要付出一分,就期望有十分的回报;甚至还没有付出,就迫切期冀回报。我不知道董明教授在做此研究的时候希望有什么回报。我只知道,做这一研究要付出难以计算的辛劳。他必须枯灯索坐,沉心静气;他必须出入故纸,翻阅旧籍;他必须像大海捞针似地,从一切可能有用的典籍里寻找可用的资料;他必须像沙里淘金似地,从他获取的资料中筛选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才能以据立论,叙事成篇。数十万字的成果,要耗去多少夤夜与假日,耗尽多少心血与精力,我不知道这会董明教授什么回报?论利,这种学术著作即便出版也不会有什么财神光顾;论名,这也不能使董明教授与那些演唱流行歌曲的明星相比。想来想去,董明教授只是为发展学术而已。”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才使作者在时下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能沉下心来积数年之功去经营这种近于拓荒的“名山事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崇尚学术的精神,董著中不仅征引资料广泛,而且大多数来自第一手资料;在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时,也都尽量注明出处。这在符合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反映出作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大海捞针”与“沙里淘金”,形象而又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作者在史料搜集与利用上的辛劳和良苦用心。董著中征引的史料,不仅有历代正史,而且有大量的笔记小说诗文集等;不仅有国内史籍,而且有国外的相关记述(如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朝鲜的《朝鲜历代史略》《三国史记》《海东绎史》《高丽史节要》《热河日记》,日本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古事记》《大日本史》《日本历史》《日本外史》,等等)。另外,作者还充分利用所在单位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许多古籍参考利用了较早的版本(如李文凤《越峤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手刻油印本;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朝鲜木活字本;周煌《琉球国志略》,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光绪十九年(1893)补刊本等)。以上这些都为董著的研究提供了充足有力的资料支持,使董著不仅能够开拓和深化该课题的研究,而且旁征博引,增强了其资料性,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史料丰赡,言而有据,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董著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五、论从史出,置论精当,且别赋旨趣。在广泛引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还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师的独特视角,对古代的对外汉语教学做了些简短的评论。由于这些评论以史实为根据,又紧密联系对外汉语教学实际,所以读来既让人感到可信,又颇具启发意义。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评论出自一位当代对外汉语教师之口,其亲切感和熟悉感拉近了学术著作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增强了董著的可读性。如对朝鲜高丽朝末期《老乞大》和《朴通事》两本汉语教材的分析,在给原文加了句读后,作者指出:“这两本书都是以情景为主编写的会话课本,形式上采用对话体,使用的是明代纯正的北京口语,其中有单句,有复句,有句群,并且含有不少固定词组和民间谚语,所依托和表现的是当时普通朝鲜人的实际生活,因此本质上已同我们现在为外国人学汉语而编写的会话课本没有太大的不同。”在此之前,朝鲜人虽然也在学习汉语,却始终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教材,而主要以儒家经典和中国诗文作品作为学习材料。严格的说,这不符合汉语口语的特点和语言学习规律,从而注定了其学习效果欠佳,具体表现就是学习者的汉语听说能力和实际语言交际能力的低下……二书的出现,则将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它们为朝鲜人提供了相对适宜的汉语学习材料,使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更贴近了汉语口语和语言学习规律,从而可望获得更理想的学习效果。因此,也可以说,二书的出现

标志着朝鲜人对汉语口语特点及汉语学习规律、学习途径、学习方法的认识有了重大飞跃。”(P161)这种分析就是紧密联系教学实际,从教材编写的内部规律出发,对古代的汉语会话教材所做的科学分析。通过这一分析,不仅活现出了当时对外汉语教学的生动情形,而且古为今用,赋予了教学史研究更多的专业现实意义。诸如此类的例子尚多,除了教材编写之外,作者还对汉语教师队伍的构成、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国际国内环境对汉语学习的影响等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关方面多有置评,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多引。

汉语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向外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相应地,作为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和在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对外汉语教学史,其学术研究也需要多学科的综合努力,领域十分广阔。即以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而言,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如董著者,限于时间和精力,亦尚“未能囊括古代接受汉语汉字传播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更未囊括古代所有接受汉语汉字传播的群体和个人”,而“完整的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还应包括近代和现代、当代部分”。我们期待着能有更多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正如董明先生所言:“完整系统的、具有科学性的、高水平的对外汉语教学史和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著作面世之日,就是对外汉语教学‘有史’之时。”(P643)相信繁荣的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必将极大地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也一定会为我们新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带来助益。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研审会召开

2003年1月17日上午,“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研审会在北京华侨大厦召开。会议由调查办公室主任佟乐泉主持。参加此项调查工作的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单位的特邀专家共计三十余人参加了此次研审会。教育部语用所副所长姚喜双、靳光瑾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共分三个阶段。首先是调查办业务负责人苏金智汇报此次调查工作的工作进程,并对调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相关说明。然后由统计专家冯士雍介绍此次调查工作的抽样方法、数据汇总方法等问题。最后是听取专家意见。专家们充分肯定了此次调查工作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语言文字国情调查,这样大规模的调查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此次调查结果对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决策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参加此次调查的专家们付出了很多心血,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为以后的语言文字国情调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专家们对此次调查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办法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佟乐泉在总结发言中说,非常感谢专家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调查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整,这是语言文字国情调查的第一次研审会,以后还要召开这样的研审会,使语言文字国情调查更加完善。

(本刊记者)